

互相指责对方“错误”的历史认识,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对立。

包括日中两国在内,世界范围的日中战争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可以展开对话的国际性团体。在此情形下,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各国研究者汇聚一堂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换意见的“共同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各国的研究者围坐一起讨论如何才能达成最终结论的“共同作业”。

二、走向“和解”的尝试——南京与广岛

为了达成“和解”,处于对立中的两国国民有必要认识对方的心理并了解其思维逻辑。因此,要将日中两国人民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导向“和解”,就需要大胆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中国领导人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对日本的侵略加以批判时,一部分或者更多的日本人就会把这一行为看作是“反日运动”。然而,不能不理解中国领导人这一行为背后存在着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怨念,以及中国一般民众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批判。甚至也可以认为这种批判源自支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有时会过于顾及人民特定的感情,这能够增强国民的一体感,但也有可能引发反对对方的运动。但是,应该将这样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人民对南京事件的历史认识区别对待。

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每年8月都会举行仪式,悼念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遇难者。日本首相会出席这一典礼,并且最近美国驻日大使也前来参加。这并无法抚平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怨念。然而,包括官方人士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以及外国人并未将此仪式视为反美运动。既然如此,日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去访问南京呢?

问题在于日中战争中的“正义”。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现在,日本、美国与中国的人民还无法完全摆脱这一认识框架的束缚。要从这一历史纠结中解放出来还需要时间与努力。为了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日本、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有必要互访战争死难者的遇难之地。

这就是我通过参加日中战争共同研究获得的一点感想。

[作者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张宪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从战争到战后:史学与中国抗日战争遗产之评价

米 德(Rana Mitter)

在西方有关二战的分析中,中国的作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尽管相对而言,中国仍旧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战区,但是,在更广范围的全球性冲突的历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变得日益清晰起来。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迈向一个新阶段,亦即要进一步推动抗战研究向前发展的阶段,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关键任务似乎在于将战后时期也纳入重新评价的范围中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民(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被迅速击垮。然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战后初期存在过一个可以利用其在抗日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的短暂机会。尽管国民政府在短短四年后便土崩瓦解,但是,至少它在国际层面取得的一些成就在大陆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国民党中国还成为了另

一个典范(尽管其存在时间不长),即作为一个非欧洲的民族国家,它成功地倡导了反帝国主义的理念——这不仅仅针对日本,还包括英国(这一事实曾让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大发雷霆)。

过去10年间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学者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创时期进行了历史学而非政治学的分析。^①然而,1945—1949年通常仅仅被视为血腥的内战时期。自然地,对于这一时期的分析将继续以内战为核心,其终结点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解释,即全球战后时期(global postwar)或曰“重建期”。1945—1950年被视为全球的转折点,而“重建”(reconstruction)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剖析该时期有力的分析工具。此外,由于冷战在历史学界已经有了确定的时间范围(1945—1991),因此,我们现在对冷战时期的起点进行分析是更为可行的——这一起点开启了一个进程,在大约45年后走向终结。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1945—1949年不能仅仅被视为抗日战争的余波期和国民政府的最终衰落期,也应当被看作是如何建设战后中国的两种理念的交锋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均为盟军反抗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大国,中国的地位在国际社会的提升与大英帝国的衰落同时发生——而在数十年前,英国还曾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英国当权派中的很多人很难接受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提升这一现实。^②尽管如此,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还是驱使英国人意识到,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容许帝国主义继续存在,尽管其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确实创造了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中国,尽管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国垮掉了。转折点是1943年1月11日新条约的签署。新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废除了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并最终确立了战后中国作为独立平等的主权国的地位:在鸦片战争爆发101年之后,“百年耻辱”终于走向了终结。同样,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得以作为战时同盟国的平等一员站立在世界舞台上。蒋介石在发表公开声明时特别强调,中国的胜利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胜利,它也推动了遍及全球的国际反帝事业的进步。

无论如何,蒋介石在1945年的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全球享有声望的领导人中,只有他不是白人,而他的声望源于中国对战争的贡献。尼赫鲁与毛泽东在后来也赢得了类似的声望,但印度的独立尚在两年之后,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还有四年之遥,且具有不确定性。蒋介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是当时东亚和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日本完全控制的地方。蒋介石感到自己完全有理由在战后秩序中(至少在亚洲)承担重要角色,美国对蒋的想法至少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然而,英国领导人却不认同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作为新生主权国家的中国并不应当被视为亚洲的一个强大且独立的角色。丘吉尔在1944年曾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的看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并且丘吉尔本人还露骨地用种族主义语言来形容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③蒋介石的当然反应就是数次批评英国对于印度的态度。然而,1945年之后的事态发展,意味着英国不得不与一个在联合国享有平等地位的真正的主权大国——中国打交道。不仅如此,在1941—1945年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英国人丢师丧地,大失颜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英国不得不改变其对于中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态度,尽管英国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模糊态度仍有余温,而英国外交部内部对于战后应当推行何种对华政策也充满了争议。甚至

^① 在西方学术界,这一变化仍在进行中。这方面典型的作品有: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2006), Special Edi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PRC.

^② 参见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 -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 26.

^③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421.

在亚洲的战事结束之前,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负责人斯滕代尔—班尼特(J. C. Sterndale-Bennett)就曾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影响某一特定政策,而是建议英国在考虑到美国的影响变得强大的情况下,选择对华积极接触。班尼特强调英国应当保持其帝国地位,同时要向美国澄清,英国这样做是出于无私,是为了收拾日本投降之后的烂摊子。^①然而,很少有中国人相信,英国在中国所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是出于无私。毕竟,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针对的就是英国的各类帝国主义行径,无论是在上海的街头,还是为了纪念印刻在民国日历上的众多国耻日。^②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及之后,蒋介石都试图寻求英国的帮助以抗击日本,希望得到英国的军事支持。然而,战时英国指挥官与中国人的关系却很糟糕,尽管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英国精英人物在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中国人眼里,英国顶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盟友。帝国主义侵略者与战时盟友之间的差距太大,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以弥合。

尽管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但战后英国外交文件显示,英国人仍旧深信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不真实的”——在战后初期多次谈判中,英国政府的声明不断地传递出这种情绪。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或许可以接受中国成为一个与其他国家地位平等的国家,但是按照罗斯福的“四警察”(或“四强”)理念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则是另一回事。甚至在1945年7月(亚洲的战事结束之前)的波茨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部还明确提出,中国的新地位是有问题的。外交部在1945年7月10日发给英国代表团的简报中指出:

把中国纳入欧洲和平构建的细节之中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并不是对德国拥有处置权的四大国之一,苏联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意中国成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相反,中国应当被视为“委员会名义上的成员”,在对德国的最终处置问题上,中国不应该拥有投票权,尽管中国或可参加相关讨论。^③

被遗忘的1945—1946年是应当被铭记的,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寻求自身位置和希望被当作“负责任的大国”相待的早期努力。当然,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使其努力未获成功。但是,国民党所关注的问题,包括调整欧美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等问题,不仅对于今天仍有意义,而且还构成了重新阐释整个战后初期历史的基础。当然,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对毛泽东的研究工作,正是他改变了1949年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但是,这项研究必须被置于抗日战争的背景之下,因为当时中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要意识到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构建后帝国主义时期的亚洲新秩序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即便这段历史与我们越来越久远,并且众多战争亲历者已不可避免地逝去。^④如果我们要重新解释今日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就必须将中国的战时体验和战后经历纳入研究视野。

[作者米德,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译者贾亚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F 4171/186/10 (7 July 1945), sec 31.

② William Callahan,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3.

③ FO files, U 5399/5399/70 (10 Jul 1945), sec. 9.

④ 在西方,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是致力于以新方法研究抗日战争的代表。哈佛大学的傅高义主持了一个中日战争的联合研究项目,并且自2000年开始一直在举办相关会议(见<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sino-japanese/>)。在牛津大学,米德主持的中日战争研究项目始于2007年(见www.history.ox.ac.uk/china)。